

拉美研究在中国

编者按：为推动拉美研究事业的发展，加深拉美学者间的沟通和了解，从2005年起本刊特设“拉美研究在中国”这一栏目。它以《国内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研究综述》的形式对上一年度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载于每年的第2期。由于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不够全面、时间比较仓促等原因，《2004年国内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研究综述》一稿肯定挂一漏万，在此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谅解。对如何办好这一栏目，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2004年国内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研究综述

蔡同昌

2004年11月11~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并出席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我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展多元化和全方位外交的又一重大举措，显示了我国对拉美地区的高度重视，出现了许多新亮点。有的学者指出，目前的中拉关系是双边交往史上最佳的时期。这一年，我国对拉美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国有企业的转制、拉美左派的崛起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2004年国内学术界对拉美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本文拟就以下四个方面分别作一简要的归纳和总结。

一 对拉美经济的研究

（一）关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直是中国拉美学界关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有许多不同的流派，有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是其强调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它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主张。作为一种经

济思潮，新自由主义传播很广，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的“国家经济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弊端日益显现，逐步陷入困境。

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美成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验场”。然而，实践证明，改革的预期和实际成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随着近年来拉美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也不攻自破了。有的学者认为，90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效并不令人满意，拉美国家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付出了代价：加大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急剧下降，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多数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也有的学者指出，拉美的自由派精英在19世纪有选择地引进了欧美的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

《两情相悦 中国拉美走近》，载《中国产经新闻》，2004年11月30日，A8版。

蒋光化：《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页。

杨斌：《阿根廷危机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4期，第52~56页。

苏振兴：《新自由主义与拉丁美洲》，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4~7页。

王翠文：《从拉美的经历看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幻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第83~87页。

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50~58页。

收稿日期：2005-03-01

作者简介：蔡同昌，男，1955年生于上海崇明县，198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编审，《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义政治和经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拉美国家所处的外围地位，自由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还有的学者指出，第三条道路向新自由主义说“不”。

但也有人认为，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评价应一分为二。在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情况需要澄清：一是新自由主义无情地蹂躏拉美，但拉美人民长期斗争所争得的免费读书和免费医疗的基本权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害，却也还没有被完全剥夺；二是把智利的经济成就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误解，是对西方主流媒体宣传的一种轻信。^⑩

就拉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过去 20 多年走过的历程，有的学者提出了 3 点看法：发展道路须以理论的同归为支撑，实施操作应以优化政府的职能为主导，国家的振兴全靠以民众为根本。^⑪

（二）关于拉美国有企业的转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拉美国家是在私人资本的主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国有企业转制的。从 10 多年的转制情况看，拉美国家的实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⑫

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公平可以理解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比较公平”：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生活条件，享受平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服务的条件，平等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应得到一个平等参与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在平等的竞争中，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能力、付出、机遇和冒险精神不同，最终效果就不同，从社会中取得的收益可能就不同。^⑬

有些学者对拉美国有企业的转制作了个案研究。阿根廷私有化从 1989 年第四季度开始，贯穿于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其方法是直接出售企业资产或股份、通过证券市场出售股份、特许权转让和租赁；其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外资广泛参与、公用事业部门在私有化中占重要地位、私有化有极强的实用主义特征等^⑭。90 年代初，巴西开始了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全面转制，主要分为几个步骤：分批转制，核实资产，制定未来的投资和发展计划；在转制过程中，将国有企业的相当部分股份以优惠价卖给原企业职工。其结果表明，转制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⑮。在智利，中小企业对智利就业和增长的贡献不仅远

远大于大型企业，而且这种趋势呈不断上升的势头。但由于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先天不足”，智利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和措施：资金支持，技术支持，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培训，促进出口，企业联合^⑯。智利的私有化进程分为两轮，每轮又分为两个阶段，其间经历了较大的反复。智利的国企私有化进行得较为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私有化收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国家作为生产者和管理者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参与程度明显减少；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普遍提高，投资增加，技术改造步伐加快；活跃了资本市场。^⑰

（三）关于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安全

有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让位于水平分工，资本、商品、技术和信息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迅速，资源的配置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

反全球化的特点可以用 4 种“多样性”来描述：反全球化运动的目标多种多样，反全球化人士的构成五花八门，反全球化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反全球化运动所需的资金来自各个渠道^⑱。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美最先卷入了全球

韩琦：《论自由主义对 19 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尹德慈：《拉美民众为何选择左翼执政党》，载《当代贵州》，2004 年第 10 期，第 45 页。

徐世澄：《一分为二看待拉美的经济改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8~10 页。

⑩ 卫建林：《拉丁美洲：“未来的名字叫变革”》，载《红旗文稿》，2004 年第 12 期，第 24~29 页。

⑪ 尹斌：《自创新路 兴我中华——拉美模式的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20~21 页。

⑫ 吴国平：《效率与公正：拉美国家国有企业转制的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1~11 页。

⑬ 廖明：《效率与公平——从拉美国家国有企业改革谈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12~14 页。

⑭ 方旭飞：《阿根廷国有企业私有化》，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20~24 页。

⑮ 吕银春：《巴西国有企业转制的做法与经验教训》，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25~27 页。

⑯ 高静：《国企改制背景下的智利中小企业状况》，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32~37 页。

⑰ 王晓燕：《智利的国有企业改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15~19 页。

⑱ 江时学：《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化的浪潮，但近年来拉美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动荡，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拉美产生了反全球化运动^⑮，拉美国家成了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头羊。^⑯

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适时地对安全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已成为每个发展中国家国策制定者须认真思考而又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必要保证和前提条件。有的学者认为，从冷战后第一个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最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墨西哥的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发展中国家要兼顾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在经济开放与政府干预之间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安全战略；在开放的国策中维护主权与保证国家安全，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独立和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要维护民族特性，保持文化独立，遵循维护人权、尊重主权和反对霸权的原则，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社会合理分配三者相结合，是克服社会安全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⑰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希望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不断上涨，同时也希望IMF在减少金融风险 and “拯救”危机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中遇到的各种危机，与巨额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随意流动密切相关，而智利在90年代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在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拉美有过两次金融自由化：第一次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南锥体国家中进行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逐渐趋于停顿；第二次金融自由化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达到高潮。

第一次金融自由化的做法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取消定向贷款和降低银行准备金比率。除拉美少数国家外，第二次金融自由化的做法是对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积极引进外国银行的参与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⑱

汇率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纽带”。有的学者指出，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汇率制度。拉美国家的决策者似乎也面临“三难选择”，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汇率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⑲。蒙代尔的“三者不可兼得论”在理论

上给决策者在处理资本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出了道难题。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汇率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⑳。另有学者指出，从技术的角度讲，拉美并不十分符合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因此，似乎不宜进行美元化。但是，下列因素为拉美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加速拉美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较高的实际美元化程度降低了丧失独立的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成本，实行美元化还可使拉美获得公信度的额外收益^㉑。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东亚国家钉住汇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占有主导地位。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基本上呈现出钉住汇率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但拉美国家表现出的规律性比东亚国家要差，甚至出现反复性。总的来说，东亚国家汇率制的经济绩效要好于拉美国家^㉒。“汇率制度两极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惟一可能长期维持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汇率制或具有非常强硬的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中间汇率制都正在或应该消失。拉美国家更趋向于采用“两极汇率制度”。从总体上看，拉美国家过去实施的汇率制度是不成功的。^㉓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主要国家先后爆发了4次金融危机，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失误，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巨额的外债和财政赤

^⑮ 杨斌：《阿根廷危机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4期，第52~56页。

^⑯ 李丹：《反全球化运动的地域特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5~99页。

^⑰ 鄢永忠：《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定位的启示——以墨西哥安全战略转变的经验教训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22页。

^⑱ 江时学：《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⑲ 江时学：《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与美元化》，载《世界经济》，2004年第5期，第42~47页。

^⑳ 国惠：《拉美汇率制度变化的启示》，载《国际商报》，2004年10月22日，第3版。

^㉑ 田贤亮、刘思琦：《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拉丁美洲美元化的前景》，载《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11期，第35~41页。

^㉒ 伍志文、李海波：《拉美和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兼谈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载《经济科学》，2004年第6期，第26~37页。

^㉓ 黄志龙：《“汇率制度两极化”：拉美国家的经验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50~56页。

字，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等等。^②

资本项目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它是一把“双刃剑”，其进程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在开放的速度上不能急于求成；要确定开放的先后顺序，尽可能做到“先易后难”；要重视汇率的作用；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在必要时应该实施资本管制措施；要灵活运用“冲销”政策；必须强化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③

1994年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巴西出现金融业并购重组浪潮。有的学者认为，巴西金融业的并购重组既是市场运作下金融机构竞争的结果，又是政府通过颁布各项法规大力推动的结果。与发达国家不同，巴西金融业并购重组具有防御性和被动性两个特点。^④

对拉美国家来说，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处于非常有利的时期，但外资和拉美本地资本的投资欲望并不强烈。有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阿根廷债务危机除了对本国的国际信誉造成沉重打击外，也使一些邻国深受牵连；地区政治形势不稳定导致投资风险加大；经济政策的“左倾”趋势使投资前景难以把握；贸易保护主义在不少拉美国家仍有较大市场。^⑤

拉美和东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地区）制度上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在“三联盟”模型，即在“官僚—权威主义”体制中，两个地区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差异。从外在制度的角度看，两个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从内在制度的角度看，两个地区也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对两个地区的经济安全产生不同影响。^⑥

（四）关于阿根廷危机

阿根廷曾是世界10大富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曾被视为世界经济改革的“典范”，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但在2001年12月爆发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有的学者认为，阿根廷危机的根源是：以偏激的方式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酿成全面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不当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多种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阿根廷危机的特点是：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而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重危机的总爆发；危机的

根源在于内因；危机持续时间长。

阿根廷危机的危害性在经济层面上使本国经济大伤元气，南方共同市场受到重挫，拉美经济再受硬伤，世界经济受到拖累；在政治层面上震撼了阿根廷的政府轮替制和民主宪制，中止了其现代化进程，沉重打击了民众对阿根廷金融安全和经济前景及对政府的信心，发展模式受到质疑。

阿根廷危机的教训是：过分迷信IMF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洋处方”，丧失了国民经济的自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经济的增长不能以社会的不公为代价，应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双赢；若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尽情舞动，国家这只“有形之手”就会软弱无力；一国若将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上，其经济势必被“牵着鼻子走”，毫无经济安全可言；汇率制作为国民经济的“传感器”，若不进行灵活调节，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混乱的导火索；一国若不加强危机预警，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一旦危机爆发就会难以收拾残局。

阿根廷危机的启示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一种合适的汇率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提高财政稳健度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必须注意利用外债的规模；政治稳定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之一；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⑦

（五）关于拉美的工业化

有的学者指出，拉美国家实行的工业化，使工业生产能力和受到破坏，制造业结构由原来的多样化向单一化回归，在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改革后制造业的增长与就业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贸易效果不佳；技术创新能力

^② 孙立、秦婷婷：《论20年来拉美四次金融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科版）》，2004年第4期，第46～54页。

^③ 江时学：《拉美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1期，第30～35页。

^④ 赵雪梅：《巴西金融业的并购重组及其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3～36页。

^⑤ 陈支农：《拉美经济改革难激投资热情》，载《金融时报》，2004年5月27日。

^⑥ 崔健、刘忠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制度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期，第19～23页。

^⑦ 关于阿根廷危机，参见江时学主编：《阿根廷危机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削弱了。^④

有的学者专门从拉美早期工业化探索了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源问题。拉美结构主义认为,只有引起经济结构和社会深刻变动的工业发展,才叫工业化。19世纪初级产品出口带动了拉美现代工业的最初发展,但并未引起社会的深刻变革,尚称不上是“工业化”。20世纪中叶拉美国家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才是拉美工业化的开始。有的学者指出,探讨拉美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既要注意它的一般性,又要注意它的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即判定一国是否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其标准对于所有国家来讲应该是共同的,就是通常说的看是否开始了非生物动力替代生物动力、工厂生产替代手工业生产的过程。大量事实表明,19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主要大国已出现了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明显过程,进入了工业化的启动期。同时,还应看到拉美工业化有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拉美早期工业化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却反而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依附性发展道路。这正好说明拉美发展道路的不同,而不能由此否定拉美工业化的启动。

拉美国家的手工业在独立前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拉美是否发生了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过渡的“原工业化”过程呢?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拉美和英国等现代化先行国都同样发生了现代工业替代传统手工业的过程,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替代”现象。在英国发生的“替代”,以“原工业经济”(手工业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大量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现代工业是在“原工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拉美发生的“替代”,则以手工业的大量被摧残和消灭为前提。因此,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是沿着另一条特殊道路发展起来的,不仅具有依附性的特点,而且明显地表现了外源性的特点。这种工业化的外源性也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外源性。^⑤

(六) 关于“拉美化”

拉美国家和中國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教训值得重视和借鉴,故而一些人提出应提防“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但有些学者指出,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

“拉美化”是在许多学者和民营企业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时提出来的,其用意和落脚点无疑是担心中国经济被外资控制。从文献跟踪来看,中国国

内最早提出“拉美化”概念是始于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道路的反思。在2004年有人提出“拉美现象”问题后,学术界围绕“拉美化”命题的讨论开始公开化,并逐步扩展到我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

学者们对“拉美化”命题的看法存在很多争议,其背后隐含着两个问题,即如何评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社会改革的成效以及对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如何“归因”。在接受“拉美化”概念的学者中,对“拉美化”的归因分析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化”的产生缘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拉美地区经济改革的误导,第二种观点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政府治理来解释“拉美化”的,第三种观点把“拉美化”归因于拉美文化中的“民粹主义”。

有的学者在坚持“拉美化”是个伪命题的基础上,提出拉美地区的发展成就不容忽视,认为拉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改革使拉美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走上了复苏之路,国民经济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财政失衡现象有所减缓,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强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度兴起。

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总结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其中值得我国借鉴的是要正确处理“六大”关系。(1)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拉美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实现“以人为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其中公正的收入分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2)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加剧了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又加快了政府的更迭,导致政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调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力推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3)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实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性改革,使广大农民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同

^④ 苏振兴:《拉美国工业化进程和经验教训》,载《中国化工报》,2004年7月3日,第1版。

^⑤ 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载《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时又面临着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大多数农民不是改革的受益者而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并最终成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群体。(4) 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规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不要政府的干预。(5) 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提高国内储蓄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很低，导致它大量引进外资，其后果是形成了大量的利润转移，对外资的依赖造成了长期困扰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6) 正确处理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和改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拉美的发展进程表明，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其技术溢出效应，形成先进技术的沉淀机制，并通过改善产业结构和提高科技水平等途径来强化国民经济竞争力。^⑥

(七) 关于拉美的农业发展

农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从19世纪初起，拉美就开始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但在农业方面却走过了非常曲折的弯路，尤其是拉美的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的学者对以往研究中有关拉美农业和土地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看法，指出拉美的经济和社会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所说的印第安人的懒散和愚昧，也不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交通不便，而是3个多世纪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大地产制。^⑦

农业问题一直是多边贸易谈判的关键，而农业补贴又是关键中的焦点。墨西哥自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为提高农业竞争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采取了由“价格补贴”转向“收入支持”的农业补贴政策，尤其是实行了乡村直接支持计划，使补贴结构在贸易自由化框架下趋于合理。^⑧

(八) 关于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

20世纪70年代末，墨西哥已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是拉美现代化程度较高、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但1982年8月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拉开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序幕，随后开始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墨西哥的改革进程有起有伏，屡屡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如1992年10月墨西哥同美国和加拿大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南北经济一体化的新模式；

1994年3月宣布退出“77国集团”，加入所谓“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年12月爆发的“新兴市场时代”出现后的第一场金融危机；2000年12月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当选总统，等等。墨西哥的改革很典型，既有本国提出的理论作为指导，又有具体的行动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有的学者认为，对墨西哥经济改革的评估应一分为二，既有成效也有失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方面表现在：通过经济改革，墨西哥基本实现了经济战略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发展模式转换成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宏观经济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逐年递增，墨西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由于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外贸迅速增长；由于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改善了投资环境，墨西哥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墨西哥的经济改革也有不少失误，尽管近20年来墨西哥历届政府推出了多项扶贫计划，但收效有限；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生产体系逐步瓦解；整个国家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国经济。

通过改革，墨西哥从特殊的政治模式——革命

^⑥ 有关“拉美化”，参见下列文献：江时学：《“拉美化”真的存在吗？——真实的拉美经济》，载《南方周末》，2004年7月15日；苏振兴：《新自由主义与拉丁美洲》，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李光荣：《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化”之辙》，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5月13日；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程凯：《“拉美化”谁的错》，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7月13日；许向阳：《如何避开“拉美化”危机》，载《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崔效辉：《警惕中国社会的“拉美化”倾向》，载《决策咨询》，2002年2月3日；曲力秋：《中国如何绕开“拉美化”》，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3月15日；张文中：《谨记拉美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中国应对“拉美化”说不》，载《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6期；曲力秋：《再看“拉美化”：“拉美化”是个伪命题》，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8月13日；张熙：《我们会重蹈“拉美化”陷阱吗？》，载《中国改革》，2002年第10期；牛文文：《中国企业领袖的“拉美化”之忧》，载《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1期；曲力秋：《再看“拉美化”系列之中国如何遏制拉美化》，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8月18日。

^⑦ 刘婷：《土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读〈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一书》，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60~62页。

^⑧ 张勇：《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政策改革——兼论农业补贴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46~51页。

制度党一党长期执政，过渡到革命制度党 2000 年大选失败、国家行动党上台，形成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三党争雄、“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③④}

有的学者以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研究重点，深入分析了战略转变对墨西哥国家主权产生的影响，探讨了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系，以及政治自主和经济开放的关系等问题。认为，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极端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解决墨西哥的现代化难题。在对外战略上，作为历史遗产的革命民族主义外交思想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出灵活的调整便会陷入僵化和教条化，面对变化中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从而失去生命力。但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漠视历史教训和漠视从这些教训中积淀下来的革命原则也是危险的。绝对的主权至上或经济至上都不可能行得通。固守僵硬的原则已不合时宜。同时，忽视经济开放的风险，放弃应有的斗争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⑤

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墨西哥的客户工业问题。1965 年 5 月，墨西哥政府颁布《北部边境工业计划》，在北部地区设立客户工业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区内建立出口加工企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客户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墨西哥也成为世界各国中发展特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然而，1994 年开始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墨西哥客户工业中的退税制只能保留至 2001 年。这样，客户工业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能会由此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特区经济形式有可能从此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⑥

二 对拉美政治的研究

（一）关于拉美左派的崛起

有的学者详细论述了拉美左派的崛起：拉美左派的主张和活动、崛起的标志、近况、“圣保罗论坛”与拉美左派、“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左派、拉美左派面临的问题和前景。^⑦

有的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随着传统左翼模式的退潮，拉美坚持正义立场的左翼在语言表达上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他们抛弃了生硬僵化的说教，采取了生动的、打动人心的新语言风格；左翼话语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色彩，主要体现了拉美“解放

者”玻利瓦尔的思想和印第安文化思想。^⑧

有的学者指出，拉美左派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最重要的标志是，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的左派政党巴西劳工党成为执政党。可以说，目前是拉美左派力量最强大的时期，拉美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左派力量最活跃的地区。^⑨

有的学者认为，查韦斯政府推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是实行左派政策的大胆和激烈的尝试；卢拉总统实行的是迂回性左派政策。^⑩

而有的学者认为，左倾和左转难以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民主政治和中庸之道仍将是拉美政治的选项；左派政治理念将不断得到修正，走“中左道路”的可能性增大；走议会民主道路已成为拉美左派的主要发展方向，民主制将为拉美左派未来的发展确定“界限”；拉美左派崛起成为拉美民主政治中一个新景观和政治发展的新选择，但能否真正在拉美形成全天候景致则将受国内外多种因素以及本身作为的限制。^⑪

巴西共产党自 1979 年因政府实行大赦而取得半合法地位、1985 年取得合法地位以来，其国内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扩大。有的巴西共产党员进入了联邦政府决策层。不过，巴西共产党虽然是卢拉政府的参政者并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并未因此失去其政治独立性，它对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均不失时机地提出意见或议案^⑫。有的学者认为，乌拉圭左派的发展值得关注。^⑬

（二）关于拉美的政治制度

^③ 徐世澄：《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④ 孙若彦：《经济全球化与墨西哥对外战略的转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⑤ 董国辉：《墨西哥发展客户工业的历史根源》，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⑥ 徐世澄：《拉丁美洲左派》，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6~11 页。

^⑦ 刘承军：《拉美左翼思想动向》，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12~16 页。

^⑧ 童炳强：《拉丁美洲——左派力量最活跃的地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17~18 页。

^⑨ 张新生：《关于当前拉美左派运动重新“崛起”的几点看法》，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19~22 页。

^⑩ 吴洪英：《对拉美左派重新崛起的初步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23~24 页。

^⑪ 张宝宇：《巴西共产党目前的政治地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28~29 页。

^⑫ 贺双荣：《乌拉圭的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34~40 页。

有些学者分析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渊源、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具体特征，对当前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危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传统的影响，也受拉美社会独特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拉美国家政治和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许多特性，都与上述历史渊源有密切关系。

一些拉美国家独立后仿效美国和法国等国的政治模式，建立了在形式上具有代议制民主特征的政府。但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立法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地方自治制度，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等，虽与欧洲国家及美国有类似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且变动性很大。拉美地区不少国家曾出现代议制民主与专制独裁、军人与文人统治交替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拉美国家军人素有干预政治的“传统”有关，但更与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有密切联系。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80年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许多国家对政治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步伐并不一致，改革的深度也有很大差距。^④

变革与发展是贯穿20世纪拉美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从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到50年代的古巴革命，从30年代卡德纳斯改革到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从90年代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到正在筹划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拉美社会经历了三波改革浪潮。从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拉美第一波改革大体上与“亚洲的觉醒”和世纪初的革命高潮相呼应。第二波改革大体上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积极探索经济体制转轨的形势相吻合。而第三次改革是在8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下展开的。其中，墨西哥从高举革命旗帜到进行社会改革搞资产国有化，再到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搞私有化、自由化直至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有些学者从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和墨西哥国内环境的角度，考察了墨西哥成为发展中国家改

革发展“特例”的“确定的前提和条件”，探寻了从“特例”向“通例”扩展的规律。^⑤

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的政党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一些国家的传统党的势力在减弱；拉美左翼党的力量在上升；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更加有序；“民主疲劳症”是拉美政党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⑥

(三) 关于拉美的民族问题

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无一例外地也都是多民族国家，除古巴外，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民族关系的情况也不一样。

拉美民族关系的特点是比较和谐，其原因在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各民族之间互相融合或同化；各种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吸收和互相影响；民族国家法律和法规的一定约束力及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一定吸引力。

拉美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印第安人问题、黑人问题和后至移民（民族）问题。印第安人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民族自治问题和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黑人问题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所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后至移民（民族）问题主要是指亚洲移民后裔与先至移民（民族）欧洲白人后裔、非洲黑人后裔、土著印第安人之间及与已存在的各种混血种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拉美民族关系问题的特征是：民族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易引发民族关系问题；民族问题是过去殖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受冷战结束后国际上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⑦

有的学者分析了“考迪罗”现象^⑧，研究了巴

^④ 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⑤ 洪国起：《革命·改革·融入国际社会——20世纪拉丁美洲社会变迁的路径及思考》，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⑥ 江时学：《拉美政党政治的新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47~51页。

^⑦ 有关拉美的民族关系问题，参见吴德明：《拉丁美洲民族问题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⑧ 王晓德：《关于拉美历史上“考迪罗”统治形式的文化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31~40页。

西的军政权问题^{⑤4}，研究了民主化巩固时期拉美的文—武关系问题^{⑤5}。有的学者认为，巴拉圭战争是近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分水岭^{⑤6}。有的学者研究了拉美的民众主义问题。^{⑤7}

三 对拉美国际关系的研究

(一) 关于美洲经济一体化

有的学者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运行，体现出南北共存性、一国主导性和经济互补性的明显特点，这些特点同拟议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存在诸多“相通”之处^{⑤8}。有的学者对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10年历程作了评价^{⑤9}。也有的学者指出，目前生活在墨西哥的墨西哥移民和美籍墨西哥人达2300万，他们为墨西哥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改善家乡贫困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⑥0}

2004年2月6日，由34个美洲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举行，会议不欢而散^{⑥1}。有的学者指出，美国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出于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便于美国阻止拉美地区以外的大国插足其“后院”；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选择和转变；满足美国巩固和扩大其经济空间的需要；符合拉美各国发展经济的愿望；避免拉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化”^{⑥2}。有的学者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当33个国家在美国市场分享“贸易创造”效应时，中国所遭受的“贸易转移”效应的损失将比北美自由贸易区时期更大^{⑥3}。有的学者认为，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存在两种可能：按照“自助餐式”框架协议，到2005年年初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步向南扩展，最后建立一个全面而综合的美洲自由贸易区^{⑥4}。有的学者通过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整体福利变化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后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墨美之间一体化利益分配状况优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利益分配状况，并由此得出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⑥5}。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与拉美国家间的农业鸿沟仍难跨越^{⑥6}。还有的学者指出，拉美移民占了美国人口的1/4，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圈和语言圈，因此拉美移民抢了美国的地盘。^{⑥7}

2004年4月3日，安第斯共同体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代表在阿根廷就建立南美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南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已形成，无疑将促进南美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南美大陆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⑥8}

(二) 关于美拉关系

2004年11月19日，第6次美洲国防部长会议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闭幕，通过了《基多声明》。在安全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而以巴西为首的拉美国家认为，美洲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因贫困而产生的结构性威胁。^{⑥9}

在2004年1月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上，昔日的“拉美北约成员”阿根廷宣布，“阿美之间的血肉关系已经结束”，阿根廷“将依照国家利益处理阿美关系”。2004年1月9日，美国政府安全顾问赖斯直接攻击查韦斯总统“在拉美没有发

^{⑤4} 董经胜：《1964～1985年巴西军人政权新探》，载《北大史学》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264页。

^{⑤5} 董经胜：《民主化巩固时期拉美的文—武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6期，第42～48页。

^{⑤6} 黄泽：《巴拉圭战争——近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分水岭》，载《青年参考报》，2004年11月3日，第22版。

^{⑤7} 董经胜：《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30～38页。

^{⑤8} 周文贵：《北美自由贸易区：特点、运行机制、借鉴与启示》，载《国际经贸探索》，2004年第1期，第16～21页。

^{⑤9} 杨志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0年历程评价》，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6～32页。

^{⑥0} 左晓园：《移民：可以借重与显效的力量——旅美墨西哥移民对墨西哥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1～44页。

^{⑥1} 张川杜：《美洲自贸区谈判不欢而散》，载《人民日报》，2004年2月9日，第7版。

^{⑥2} 陈支农：《谁最看重美洲自由贸易区》，载《经理日报》，2004年6月18日，A4版。

^{⑥3} 杨志敏：《FTAA：冲击中国》，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6期，第48～50页。

^{⑥4} 佟福全：《两种可能——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进展及前景》，载《国际贸易》，2004年第8期，第34～38页。

^{⑥5} 张彬、张澍：《从南北美洲一体化利益分配看 FTAA 的发展》，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77～82页。

^{⑥6} 徐庭娅：《大美洲好梦难圆——美洲自由贸易区前景解析》，载《中国经济导报》，2004年2月26日。

^{⑥7} 辛本健：《人口占了1/4，还有自己的政治圈和语言圈——拉美移民抢美国地盘》，载《环球时报》，2004年3月5日，第7版。

^{⑥8} 刘宏：《南美自贸区启动在即》，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12日，第7版。

^{⑥9} 许宏治：《两种安全观的冲撞》，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2日，第7版。

挥建设性作用”，而查韦斯则于1月10日抨击美国政府和赖斯本人“肆意攻击他国政府”，“根本不尊重他国主权与民选总统们的形象”。^⑩

2004年12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古巴，与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发表了《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联合声明，因此有的学者指出，这是两国“联手公开向美国‘叫板’”。^⑪

（三）关于欧拉关系

2004年5月1日，10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有的学者认为，欧盟东扩对拉美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政治影响。对拉美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贸易、外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对外发展援助和自由贸易谈判4个方面。影响的结果不都是正面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响。^⑫

2004年5月28日第3届拉美—欧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召开。会议在推进多边主义、促进社会发展和双边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欧盟与拉美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本届首脑会议首先在全球事务上协调立场，在发表的《瓜达拉哈拉声明》中强调，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基础上的多边体制是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联合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双方在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上形成一致看法。在社会发展方面，欧盟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履行其在蒙特雷联合国发展融资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帮助拉美国家消除贫困，同时将以“千年发展目标”为指导，为拉美提供“可衡量的”发展援助。^⑬

（四）关于中拉关系

2004年11月11~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取得了突出成果：奠定了新基础、开创了新局面，给中拉传统友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出了新主张、阐明了新思路，积极引导亚太合作进程；广交深交朋友，积极阐述中国内外政策，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⑭

就胡锦涛主席对拉美4国的访问，有的学者指出，这次拉美之行体现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新特点：中拉最高领导人当年内就实现互访，在中拉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与拉美3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很可能带动一批国家承认我国的这一地位，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迈出了新步

伐；中拉贸易额将大幅度增加；在“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问题上，中国得到了这些拉美国家的有力支持^⑮。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发展顺利，经贸合作潜力巨大。^⑯

而对胡锦涛主席的拉美之行，有的学者还指出，美国担心别国抢占市场，害怕后院趁机崛起，美国不愿中国与拉美交往，美国患有“中国综合症”^⑰。还有的学者指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后，中拉之间的贸易必须遵守WTO的准则和规则。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的拉美之行为中国产品打入拉美市场扫清了障碍^⑱。而有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制造”将遭遇拉美反倾销潮。^⑲

四 对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拉美的社会保障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正面临着场无声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和采取对策应对老龄社会的种种挑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对现行体制的调整、完善和改革，建立一个适应老龄时代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掀起的全球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浪潮中，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结构性改革，建立个人账户制度，将私营部门和市场机制引入养老基金管理这一政府专属领地，在社会保障领域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此，有的学者

^⑩ 何淇：《唯美国意志的时代已经终结》，载《文汇报》，2004年1月14日，第6版。

^⑪ 李娟：《古巴委内瑞拉联手公开向美国“叫板”》，载《世界新闻报》，2004年12月21日，第2版。

^⑫ 贺双荣：《欧盟东扩对拉美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8~11页。

^⑬ 叶书宏、宋心德：《欧盟拉美“越走越近”》，载《北京日报》，2004年5月30日，第4版。

^⑭ 《胡锦涛拉美之行成果丰硕》，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6日。

^⑮ 张家哲：《中国与拉美：携手开创新局面》，载《解放日报》，2004年11月28日，第3版。

^⑯ 韦伟：《中国拉美：最遥远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谈中国拉美双边关系》，载《解放军报》，2004年11月15日，第9版。

^⑰ 魏红霞：《美指责中国向拉美渗透》，载《环球时报》，2004年9月13日，第7版。

^⑱ 宋晓平：《拉美市场商机不少》，载《世界新闻报》，2004年11月26日。

^⑲ 载《科技日报》，2004年6月20日。

专门研究了拉美国家的养老金问题^⑩，称拉美是养老金改革的实验室。^⑪

拉美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始于1981年的智利。智利是拉美最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而其养老金制度改革则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是智利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智利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是在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军政权独裁统治下进行的。在军政权独裁统治下，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有助于改革的实施。稳定的宏观经济，资本市场的发展，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行，是智利实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

在世界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中，智利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与当时世界上4种养老保险模式——投资助型、福利国家型、国家保险型和强制储蓄型——不一样，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类型。智利第一个将由国家筹资和管理的国家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转为由私人公司管理的个人账户式完全基金制养老金制度，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智利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增加了国民储蓄，为资本市场提供了资金来源；促进了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与繁荣；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保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⑫

有的学者研究了家庭暴力对女性的影响^⑬及拉美儿童和青少年的贫困问题^⑭，有的学者研究了拉美人口的老龄化问题。^⑮

（二）关于拉美文化

有的学者指出，综观拉美文学在20世纪的变化，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拉美作家的个性极强，自由散漫，桀骜不驯，喜欢标新立异，绝对不人云亦云，善于学习但绝对不事模仿，因此独辟蹊径成为时尚，但在这些拉美作家的个性创作中仍然表现出某些文化发展背景上的统一性；文学观念和

创作方法受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党派直接干涉，但每个作家仍都有自己的思考，他们在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追求中进行选择，做出调整；寻找适合本国和本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评论界与创作界常常是同一批人，形成良性互动，有批评，甚至激烈的辩论，更有经验交流、感情上的支持、声援和鼓励。^⑯

有的学者对20世纪各个时期拉美小说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介绍了拉美作家加乌乔、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博尔赫斯、萨瓦托、奥内蒂、鲁尔弗、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和多诺索的小说，介绍了现代主义晚期的小说、地域主义小说、墨西哥大革命题材的小说、土著主义小说、先锋派小说、走向21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通过对这些作家的介绍，学者得出结论：拉美文学是由一朵朵奇异的鲜花组成的，这些鲜花是作家们辛勤培育的结果。这是一种创新、进取和充满奋斗精神的语言艺术的劳动，它既受拉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是作家们艺术追求的反映。^⑰

（责任编辑 鲁渝）

^⑩ 有关拉美国家的养老金问题，参见刘纪新：《拉美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

^⑪ 《拉美：养老金改革的实验室》，载《健康报》，2004年11月23日，第5版。

^⑫ 刘纪新：《拉美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

^⑬ 林华：《拉美国家的家庭暴力问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0~53页。

^⑭ 林华：《拉美儿童和青少年的贫困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7~41页。

^⑮ 《拉美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2月11日。

^⑯ 赵德明：《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嬗变》，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34~43页。

^⑰ 赵德明：《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小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